

《白鹿原》现代性叙事的历史面向与审美面向

葛娟

摘要：《白鹿原》现代性叙事包含着历史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对立运动。小说以家族史和革命史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现代社会变革，又以意象化笔法呈现传统乡村文明在与现代历史时空对照中获得的审美价值；“原的剥离”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衰落的必然趋势，“白鹿神话”则作为民族文化之魂的象征，颂扬儒家道德力量及其文化人格。在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现代性基本表现手法之时，《白鹿原》通过现代叙事形式拓展了“写真实”的边际。历史和审美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小说叙事空间及其文本内涵得以拓展和丰富。

关键词：《白鹿原》；现实主义；现代性叙事；文本内涵

作者简介：葛娟，女，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20）01-0108-06

当作者陈忠实将小说叙事时空切入到辛亥革命前后的白鹿原，思考和展示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乡民怎样生活和生存时，当他颇为得意地用“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个句子来开篇时，即意味着《白鹿原》写作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视域。现代性内涵丰富而开放，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解释，存在着两种剧烈冲突的现代性：一是社会领域的现代性，二是美学的现代性。^[1]两种现代性亦分别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如果说，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詹姆逊语），那么文学叙事本身也包含着这两种现代性的区分或对立：“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2]它们可表征为历史化和审美性两种叙事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历史化主要指向“民族-国家”话语建构和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主题，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见证；而审美性则体现为具有感性主义的现代审美文化经验及情感倾向，其中包括小说艺术形式的现代化探索和创新。

《白鹿原》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正是国内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最为盛行的时期。陈忠实对现代性及当时的文化思潮有比较清醒的认知，他“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叙述话语。如果我们将本文首句包含的两层意思理解为《白鹿原》历史化和审美性两方面叙事的开启（尽管历史与审美是小说的一体两面，将之分开仅是为了分析性研究），便会发现，《白鹿原》作为一个历史化文本，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个时间节点切入，审视和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走向；而在形象化地书写历史过程中，小说又以感性化的审美形式呈现出对传统文明的深情眷恋。这样，理性和感性、历史化和审美性之间就存在分离、对立、冲突等。各种对立关系相互缠绕，客观造成了《白鹿原》文本意义及价值表达的复杂性。研究者对《白鹿原》历史观念及价值取向的质疑和讨论多由此而生。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现代性和传统性不同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诞生伊始就是一个矛盾体，启蒙的现代性同时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审美的现代性。换言之，后者的存在就是为了与前者冲突和抵触”^[3]，那么就能理解小说现代性叙事包含的历史化与审美性两方面力量发生的碰撞，亦即陈忠实一旦选择了现代性叙事，文本意义的内在张力也由此而生。

一、被叙述的历史与被追忆的乡村

白鹿原紧邻古城西安，是陈忠实的桑梓之地，也是他的精神之乡。这道历经风雨剥蚀的古原，突然有一天在他的眼前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作家的历史思绪被触动了：“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是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4]如此，带着历史感和神秘诗意的白鹿原进入到陈忠实的笔下，他的历史沉思一开始就落在20世纪初这一新旧交替之际，关注被剪了辫子的白嘉轩、鹿子霖们所处的“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的现实性境遇。陈忠实的现代性意识是自觉的。

他曾回顾一本美国人写的《日本人》给他的“惊悚”感受：“明治维新使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彻底变革，而绵延了2000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4](185)}这个“必然性”历史过程内含的现代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现代以来的中国一直为不断激进化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所支配，“民族—国家”话语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主要叙事内容。

至于被叙述的历史，即指小说对历史的呈现方式及其具体形态。应该说，《白鹿原》既是一部村庄史和家族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革命史。二者既相对分离，又彼此渗透，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前者以白嘉轩、鹿子霖两家实力之争为叙事主线；后者主要以鹿兆鹏、白灵的革命斗争为核心内容。白、鹿两个家族同宗同祖，白家是耕读传家，仁义立范，鹿家靠祖上“勺勺客”致富，被认为“根子不正身子不直修行太差”。白嘉轩与鹿子霖除了德行的差别外，两人的对立，还可以通过乡约/乡约、祠堂/保障所、长袍/制服、书院/学堂等几组对照关系来显示。当白嘉轩作为白鹿村族长，带领族人在祠堂诵记乡约——儒家教化仁义道德之准则时；鹿子霖当起了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的乡约——政府设立的乡级管理机构官员，并利用职权乱征印章税。当白嘉轩敬仰朱先生那一身蓝布长袍的风范，而对何县长穿着猴里猴气的制服不无遗憾时，鹿子霖正脱下长袍马褂穿上了一身新制服。当白嘉轩让儿子坚持在白鹿书院念书时；鹿子霖却将两个儿子送到城里新学堂。这几组对照关系可以简单勾勒出白鹿原新旧交替中的乡村面貌。对于白嘉轩来讲，他要用自己的不变来应对世道的变化。当儿子白孝文慌张地跟他说：“这回真个是天下大乱了！”他说：“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咱家有咱家的活法儿。咱只管按咱的活法儿做咱要做的事。”这种不变之道和活法儿，使他能够面对自己家族和白鹿原的一次次兴衰起落。然而，白嘉轩的不变之道终究抵不过世道的剧烈变化，白鹿原的原生态社会结构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变革打破了。革命以破坏旧秩序的方式突入到村落史和家族史叙述中。

如果说“现代性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进程，它无疑具有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品格，显现为一系列推动和主导历史变革发展的事件和运动”^{[2](7)}，那《白鹿原》从家族史到革命史的叙述，就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从乡村话语转到了国家话语，其中鹿兆鹏和白灵的革命史叙述在小说中占据了较大的篇幅。鹿兆鹏，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从领导黑娃在白鹿原烧粮仓和掀起风搅雪农协运动开始其革命生涯，之后他经历的国民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壮大红军力量，在白鹿原建立党支部、开辟根据地等，形成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小说在鹿兆鹏身上基本浓缩了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用作者的话说，“这个古老的原和中国革命基本同步，没有推迟更没有留下空白。”^{[4](109)}而鹿兆鹏、黑娃攻克白鹿原最顽固的堡垒，砸坏祠堂和那刻着乡约的石碑，意在摧毁白嘉轩、朱先生要延续的传统文化秩序。白灵身为白嘉轩女儿，是小说中一个闪光的青年女性，她背离了最具传统风

范的旧家庭，义无反顾奔向革命道路。陈忠实要告诉读者：“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秉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4](120)

革命使社会加速度向前发展，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会彻底中断，乡村生活方式也不会突然终止。相反，它以自然温馨的格调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和诗意想象，这是现代性叙事的审美指向。实际上《白鹿原》存在两种“文化时空”——现代性历史时空和乡土中国时空。^[5]与前者相比，乡土时空似乎被排除在历史性时间经验之外。白鹿原地处关中，延续着中国农耕文明最悠久的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小说的相关描述不仅融入陈忠实切身的乡村生活体验，且融进了他生命深处的情感追忆。他从厦屋脊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引发了到白鹿原的这种呻唤——这是笨重的牛车一次次在村庄缓慢行进的嘎吱声，是男人们嘴里长长旱烟管传出吱溜吱溜的水响声；也是白嘉轩、鹿三这些原上男人一年到头犁地、翻土、种植、送肥、收割的忙碌场景，是鹿三每天几次给牲畜添草拌料还要垫黄土铡青草的不停身影；是白嘉轩每天一早在院中发出的沉重而威严的咳嗽声，也是他每天晚间在母亲床前坐上一阵子的静默无语时刻。如果将现代性历史时空能够撇置于外的话，“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构成了白鹿原乡村世界的整体意境。小说中牛车、犁地和马厩等情境多次重复性描述，意象化地呈现了乡村生活图景。

尽管陈忠实力图通过“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来追忆白鹿原的过去时态，尽管那浑朴实在的乡村图景源自于生活本身，但清楚的是，乡村世界的美感和诗意是在现代性语境中获得的。《白鹿原》所写的传统乡村景象恰与现代历史乱象构成对照。劳作、闲暇、安宁不时被兵乱、暴动、革命打乱，正因为此，那份悠然和宁和之美才显得珍贵和难得。这很合乎罗兰·巴尔特的观点：“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之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正如整个现代艺术一样，文学的写作既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6]乡村叙事的审美意义在于，它是审美现代化的一部分，它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梦想之地，那是每个人心里都存有的一个精神原乡。具体到《白鹿原》，乡村叙事不能从历史时空抽离出来，白嘉轩们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安宁的种庄稼过活的日子，原来的生活图景到此已褪化为白鹿原的一个底色。但在时代变化面前，底色的彰显愈加显示其迫切和重要。

小说关于白孝文以滋水县保安大队长身份重回白鹿原老家的一段感慨颇有趣味：“母亲织布的机子和父亲坐着的老椅子，奶奶拧麻绳的拨架和那一摞摞粗瓷黄碗，老屋木梁上吊着的蜘蛛残网以及这老宅古屋所散发的气息，都使他潜藏心底的那种悠远的记忆重新复活，尤其是中午那顿臊子面的味道，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只有架着麦秸棉秆柴火的大铁锅才能烹出这种味道。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起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7]乡村之美只能保存在怀想和追忆之中，推而论之，是怀想和追忆造就了一个传统化的乡村世界。这与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说的“传统的发明”颇为类似，那些表面看来或声称是古老的“传统”，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当社会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8]乡村传统书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性的焦虑。《白鹿原》的现代性内涵就潜藏在那些时代变革与乡村传统相互抵触的描述中。

二、“原的剥离”与白鹿精魂的深情守望

陈忠实曾用“剥离”一词，记述他的一次巨大思想转变。现在他将剥离的视角转向了 20 世纪初的白鹿原，认为这原上的人，“无论男人和女人，也遭遇到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

有文字记载的白鹿原，遭遇或者说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剥离。相对于渺小的我的剥离，这是一座原的剥离。”^{[4] (105)} 此处的“剥离”，是由现代性社会变革引发的。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9] 实际上，社会变革又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革故鼎新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那么，用“剥离”一词更能恰切地表述现代性对传统文化冲击和分解的复杂性。小说中朱先生抄写给白嘉轩的“乡约”，伴随乡土中国现代性的开启，不再一统白鹿原天下了。有人守护它，有人远离它，有人背弃它。陈忠实并不是简单地将维护与反抗乡约文化写成两种力量的对抗状态，他要探寻“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秘史”正是特定文化制约下的“心灵史”，因此，“原的剥离”就成为他进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层面，透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脉象的重要途径。

白鹿书院和朱先生，是白鹿原延续的传统文化精神象征。作者在朱先生身上，凝聚了儒家最高的道德力量和理想人格。劝退清兵、犁翻罍粟、抄写乡约、编写县志，发赈灾粮、发表抗日宣言、拒绝为国民党作反共宣传等实际行动，使之超越和区别于那些拘泥于书本的迂腐儒士。但在极速发展的社会潮流面前，他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力量日渐式微，面对政治风云变幻、饱受天灾人祸的白鹿原，他只能发出“鳌子说”的慨叹和为乡民献上赈灾之力；面对学生走光的白鹿书院，他只能以编修县志来体现自身价值；面对国民党将抗日军队力量转来对付共产党时，他投身抗日的豪壮行为转为贸然冲动的自省。大丈夫身逢乱世，不能立心立命，更不能开太平，夫当何为？所以朱先生最后的仙然离世，却也寓意着白鹿书院文化之脉的行将断裂。白嘉轩说：“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该是对数千年传统文化衰落的悲叹。作为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靠“乡约”，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他要维护的是宗法制度下的文化秩序和伦理道德。他带领族人修建祠堂，拜祭祖宗，恪守乡约，惩治小娥，鞭答孝文等，都是在践行“乡约”的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言，白嘉轩、白鹿原和乡约已经三位一体了。但时代在变，以“乡约”规训自己和他人的白嘉轩，遭受一次次重大打击：最疼爱的女儿白灵以命相胁，叛离了家庭走出了白鹿原；最器重的长子，族长继承人白孝文彻底堕落；最挺直的腰板被当了土匪的黑娃叫人打断；而最让他难以应对的是无休止的苛捐杂税和抓壮丁的乱世，他知道祠堂也不再能够充当人们的精神避难所，他只能对族人说除了大年初一祭祖，任啥事也别找他族长了。这样，白鹿原也就不再是白嘉轩的了。

与鹿兆鹏、白灵等自觉反抗旧文化旧道德不同，黑娃当初砸烂乡约石碑的行动，是被鹿兆鹏领导的农民革命召唤出来的，显然带有他个人的报复心理。他与田小娥的偷情、相爱和成亲，触犯了封建伦理道德；他当土匪，更是对仁义白鹿村的最大叛离。但出自于身体和精神压抑之下的本能反抗，并未改变他的传统文化心理构成。黑娃精神之根还在白鹿原祠堂，当他归顺保安团之后，即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并回白鹿原烧香拜祖，他从内心深处没有将自己从白鹿原剥离出去。甚至被白孝文押回白鹿原杀害之前，他还说了句：“能让我躺到我的原上算万幸了！”同样是回乡认祖归宗的白孝文，尽管跪倒祠堂，其实早已在精神上彻底背叛了白鹿原。他的阴险无情使之完全走到了传统道德的对立面。而白嘉轩的老对手——鹿子霖，一直不屑于“白嘉轩就知道整天弄祠堂”。他的功利人格和为非作歹，一次次践踏了乡约文化精神，也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恶果。

“原的剥离”对于朱先生、白嘉轩、鹿兆鹏、白灵、黑娃、白孝文、鹿子霖，有着不同的意味。但无论是乡约文化传承者还是背离者，他们都曾共同拥有这块古老的原。现代性虽然意味着断裂，但它无法抛弃文化传统。传统使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内在的生命力，《白鹿原》中那只不时从原上轻盈跃过的白鹿精灵，就是作者精心构建的用以承载白鹿原文化精神的一个中心意象。白鹿，是白鹿原的神祇。小说开头对白鹿有集中的文字描述：“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鹿蹦蹦跳跳像跑着又像

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唧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7](23)}这只给白鹿原带来吉祥、安乐的白鹿，有着丰厚的审美内涵。白鹿显灵给落在人生低谷的白嘉轩带来命运转机。那在慢坡上发现的埋在地里的灵异植物，被朱先生点破是白鹿的象形。白嘉轩因之设计将鹿子霖家那块地换到了自家，随之，娶回了第七任妻子仙草。仙草，该不是那棵灵异之物的化身？她让白家很快人财两旺，家道振兴。白鹿作为吉祥之物，在白嘉轩这里首先陈述的是神话最古老的涵义。而对其女儿白灵来说，白鹿神话表达了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憧憬。白灵加入共产党时说了句：“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白灵牺牲那夜，父亲、奶奶和姑妈都梦到白鹿闪现而逝。她的生命像白鹿那样美丽并化为永恒。朱先生去世，妻子“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白鹿精魂”是朱先生写给鹿兆海出征抗日的字幅，也是朱先生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进而言之，它就是闪耀在他和白嘉轩身上厚德载物、仁爱大义、克己自律、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儒家道德精神。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文化精魂。白鹿精魂就是《白鹿原》要表达的思想之魂。当它以“集体表象”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时，它像梦境一样虚幻和神奇，充满浪漫气息。白鹿每一次从原上掠过，那晶亮莹白的鹿角和通体的白色，闪耀着感性之美。

三、“写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现代叙事形式

从师法柳青的经典现实主义，到决心彻底摆脱柳青的“阴影”，陈忠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自觉体认到现实主义“变法”之必要。他说：“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4](195)}这一观念呼应了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思潮流。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和文化思想观念不断解放，当代文学必然要求现实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品质。《白鹿原》正是这样一部体现陈忠实上述创作理念的典型样本。在现代性叙事方面，它充分容纳了作家“写真实”的生命体验，表现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深切把握，以及艺术探索所追求的美学高度。

“写真实”是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不光是要忠实于外在的客观生活的真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生活的主观体验的真实。”^[10]这就包括陈忠实所说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两个层次。而上升到“生命体验”的创作，成就了《白鹿原》这部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且看小说中田小娥的形象描画，田小娥的叛逆和抗争是自发的，无论是她对郭举人的报复及与黑娃最初的情爱，还是对鹿子霖的依附和白孝文的引诱，都基于反抗封建文化压迫的本能需求，显现出田小娥形象中的“原初共性”，但这一形象的意义更在于，小说将田小娥置于在自我意识觉醒和迷茫中，展现了人物自我认同的艰难。她与鹿子霖关系决裂时的那番告白，既清醒地划出与鹿子霖在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别，又对这一身份之别进行无情的嘲骂，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得以萌发。而她在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命绝之际，近乎本能地喊了一声“大”，封建道德伦理又在根深蒂固地规约小娥自我身份的建立。陈忠实曾回忆自己写了田小娥生命最后一瞬，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顺手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字条的情形。^{[4](79)}作家正是以这样深切的生命体验，谱写了《白鹿原》一个个富有生命质感的人物形象。

生命体验绝不仅仅是感性层面上的“感同身受”，它包含作家深刻的社会历史认知和生命哲学思考，与现代性有着内在的关联：“主张写作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这种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更加契合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各种生命哲学或文化思潮的核心精神。”^[10]我们还可以从白嘉轩和鹿三的主仆关系描写中，领略作者对这一核心精神的阐发。鹿三对白家的忠心，自以为天经地义。当儿子

黑娃“僭越”了主仆身份关系的约定，鹿三认之为逆种；他之所以杀害田小娥，也因为害了白孝文——白家的长子。而白嘉轩对鹿三的“善”，自然是对应其“忠”。鹿三死了，白嘉轩涕泪横流：“白鹿原上最好一个长工去世了！”小说描述的理想化主仆关系，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解体而解体，这是作家的历史发展意识和生命情怀赋予鹿三形象的时代内涵。

从审美现代性讲，小说首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是对魔幻现实主义之作《百年孤独》开篇的致礼，显现了《白鹿原》的现代性叙事风格。在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现代小说风靡的80年代中期，陈忠实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现代文学中的营养元素，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叙事形式。仅就小说叙事结构而言，《白鹿原》每部分开始先叙述情节新的进展，再回叙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它不仅改变线性叙述的单调，也压缩了单线叙述的长度。这是现代小说结构上较常见的方式。我们可以从“白灵之死”叙事单元领略小说的结构艺术。这一单元情节安排打破线性发展顺序，时间前后交错，空间不断转移，叙述角度几经变换。这里用破折号表示白灵之死叙述上的中断和转合：当初（30年代）白灵离家出走，已交代其后来的牺牲——（40年代）白嘉轩梦到白鹿飞跃闪入地缝，寓意白灵已死——（50年代）白嘉轩被告知白灵已牺牲多年——（80年代）作家鹿鸣了解白灵牺牲情况——（40年代）叙述白灵之死经过——（80年代）鹿鸣对历史悲剧的反省——（40年代）其他叙事线索展开。作者对故事框架的处理，并非是刻意制造结构变化，“而是人物的生命轨迹决定着这个结构的框架”。^{[4] (25)}将白灵命运及其牺牲放在一个历史跨度中展示，不断回返式叙述，加强了故事的悲剧感，带给读者拉锯式的痛苦体验及其反思。概言之，“白灵之死”的叙述验证了陈忠实“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4] (182)}的小说结构观念。

参考文献：

- [1]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顾爱彬, 李瑞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43.
- [2] 陈晓明.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1.
- [3] 周宪.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J]. 哲学研究, 2000 (11).
- [4] 陈忠实.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6.
- [5] 房伟. 传统的发明与现代性焦虑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6 (4).
- [6] [法] 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文集——写作的零度 [M].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55.
- [7]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426.
- [8] [英] E·霍布斯鲍姆, T·兰格. 传统的发明 [M]. 顾杭, 庞冠群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5.
- [9]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11: 4.
- [10] 李遇春, 陈忠实. 走向生命体验的艺术探索——陈忠实访谈录 [J]. 小说评论, 2003 (5).

[责任编辑: 高辛凡]